

杜维明著作系列·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



[杜维明著作系列·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_下载链接1](#)

著者:杜维明 著

[杜维明著作系列·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很喜欢，一直再买，一直在看，看的速度赶不上买的速度

2009年杜维明到吉大进行访学，有幸一睹大师风采，非常亲切，他的著作也是开启一个新儒家时代的重要节点，还是值得细细品读的

包装精美，物流速度真快，服务态度也很好。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才能静心。

买书是最大的喜悦就是，充实的满足感哈哈，

包装精美，送货神速，态度尚可。

老公买的，他说不错，书不错的。

东西可靠，服务挺好！，下次还来

收录文章多来源于美国、港台地区等颇有影响力的杂志，纽约《联合杂志》、香港《明报月刊》《人生》

伯克利十年伯克利十年

给力！很快！而且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心路历程，内容很好！

京东一如既往的好用，希望更多活动

赶着活动买的，超值超划算！

很不错的书，内容很好

200-100活动买的，超值超好！

都还不错了，值得一读

提供不一样的思考，重新看待儒学！

30、40间的小文，最见真义。

朋友推荐的 蛮好的~

好书，不错，挺好

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

杜维明的书

送货速度很快~书很完整

这本书还算不错不错。。。。。。。。。。

好书。我很喜欢。?_?。。。。。。。。。。

值得推荐

儒家学说过时了吗？不，永远不会，这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根。只要身处中国，学做人、学做事，就必须了解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影响从古至今渗透千年，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受着儒家文化的影响。要认识他人，必先认识自我。新儒学领军人物杜维明将儒学与当下中国的现实相结合，让儒学迈进了“自由之门”——儒学依然可以解决当下人们的心灵困惑。杜维明50年求学治学3部曲《龙腾之旅》《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现龙在田》以充满才情的文字，向我们娓娓讲述了一个学者游历世界名校，所感受的心灵震荡！
三部曲所收录文章多来源于美国、港台地区等颇有影响力的杂志，纽约《联合杂志》、香港《明报月刊》《人生》等，风靡一时。
《杜维明著作系列·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是杜维明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第二部。
杜维明70年代初短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1-1981年转赴伯克利，本书所收文章是这一时期的心得随笔。伯克利十年，也是杜维明自动选择了一条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

血她与男友在一起甜甜蜜蜜如胶似漆她在学校对我设计陷害被反报复后歇斯底里她被男友抛弃往事败露无法立足被学校开除后的绝望悲怆无数个她在脑海里汇集最终融为一体此时脑中剩下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她瘦如材骨精神恍惚的模样而现在他们说张诗诗死了她在凌晨的精神康复中心拿着一根磨平的牙刷结束自己的生命往事像潮水般不断翻涌挤得心口发痛我用力地闭上眼睛在这狭隘的空间轻声喘息夏昕你怎么了李维克突然开口打断我的思绪脸上冰凉的触感慢慢唤回我的意识睁开眼他的脸被隔绝在薄薄的水汽之外看着模糊的后视镜我才发现自己哭了多么可笑恨之入骨的人死了我居然会为她掉眼泪我没事就是想起了以前的事顿了顿我又补充一些很不好的事”李维克点点头将车窗摇下凉风让我清醒一些他微笑道：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追忆往昔只会让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他说话时并没看我目光深邃笔直望向前方仿佛自言自语路程还有一半我重新闭上眼睛打算小憩手机又一次响起我看了李维克一眼滑下接听：喂”夏昕你接到班长电话了吗嗯接到了”准备出席吗李维克陪我一起你应该也会过去吧电话那头很嘈杂我听见她轻声应了一句通话结束前我像魔怔一般突然道：周舟要不我们送个花圈过去她怔了一下只说了句好”便挂断电

自己感兴趣的书，所以不专门推荐。

读了

物流太慢

1962年，一位年仅22岁的年轻人获得燕京学社的奖学金，脱下军装，从宝岛台湾飞赴哈佛大学求学。当时的他，恐怕想象不到日后自己将成为一位世界级的思想家。刚入哈佛时，寂寞、凄凉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日日夜夜向年轻的心灵袭来。有教授劝他改行，因为在美国研究历史和中国哲学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博士至少要念八九年，念出来后还不一定能找到事做。而学理科就要容易很多。“我心里想这太荒谬了。我就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只有这条路对我来说最适合，我最有兴趣，其他的路即使成功了，比如真能成为第一流的物理学教授，甚至能够得到很多的奖金，对我来说感觉它也不是很大的诱惑。”

虽然不知道自己在海外研究儒学，会有什么结果，“尽管有时选择起来很难，但想到自己真正的需要的时候，可供选择的只有一个”。——这也许就是天命的召唤吧。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他做到了以一人之力改变整个格局：1928年以来，他是哈佛东亚系的第一位华人系主任。哈佛大礼堂的讲台上，他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他叫：杜维明。

一位对中华文化怀有“真认同”又时时深感“恐惧与战栗”的海外学子，是如何从“夕惕若厉”中成长为国际学坛中，中国文化最知名的发言人的呢？很幸运，在大洋彼岸紧张学习之余，当时的杜维明养成了挤出时间写一些学术随笔，向台湾的报章杂志投稿的习惯。这些长短不一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他最真实心路记录。

周汝昌（一九一八年出生）：天津人。本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言。著名红学家，中华文化研究专家，书法家和诗人。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中文系研究院。先后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员、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美国鲁斯学人，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有七十多部著作问世，分别为《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恭王府考》、《石头记会真》、《周汝昌校订评点石头记》、《我与胡适先生》、《千秋一寸心》、《永字八法》等。《曹雪芹传》由美国、日本分别翻译出版。我怎么会和《红楼梦》缔结了文缘？不可思议。也许这并非“文”缘，而是“灵性已通”的感悟之缘，亦未可知。因为在中华文化上讲，聪颖智慧之更高层，还有精神交流的天人合一之事理，这在我们叫做感悟，曹雪芹采纳了晋代艺术大师顾恺之的用语，叫做“通灵”，也即是交感而悟知的意思。人的精神活动，有此一义，并不玄虚，更非神秘。人之所以与其他动物有别，最要者就是赋有一种灵性--就是能感能悟的能力。此能力与智与慧不无关联，但不等同；比如有人“智商”很高，记忆力特强，推理逻辑极周密……他会成为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但不一定都能有“灵

性”，感悟性较差，这种例子所在皆有，普通现象也。

鄙人出身寒微，有些人误以为是书香门第，那相差太远了。寒门坐落天津与大沽之间的一个村镇名曰咸水沽--水实甚佳，一点也不咸；听说大港那边有一处叫甜水井子，水却苦而不甜，相映成趣。咸水沽地处旧海河大湾之东南岸，为天津府八镇之一，属七十二沽之列。这一带“起家”的都是养船户，劳动人民。伯祖父周锐，本是大船户韩家的一名伙计，其后成了创业人，自己有了大木船。

对以上这些发酵食物的描述感到厌恶了呢？这样的反应合情合理。厌恶作为一种情绪，最基本的形式与目的就是放大以及回避腐烂与有毒的食物。既然如此，为什么发酵的口水、腐烂的鲨鱼、长蛆的奶酪还会在某些地方如此受欢迎？我们不顾所有的腐烂特征，渴望食用这些食物，这难道是人类自身的一个矛盾？答案是否定的。这种矛盾说明，从广义上看来，恶心与不恶心，仅由个体自己决定。汝之美味，吾之毒药

社会认知心理学与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在整个心理学领域方兴未艾。简而言之，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旨在阐述情绪性与社会性体验与行为的心理与神经基础。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主题之一便是人类的情绪。本书作者蕾切尔·赫兹女士正是选取了人类情绪中，最为复杂的情绪之一——厌恶——来阐述这一情绪体验及其产生的行为背后的心理与大脑神经机制。本书深入浅出地向人们揭示了“厌恶”这一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情绪背后的故事。此外，本书作者将主题从情绪本身进一步引申到人类发展中进化以及文化因素的重要意义，通过“厌恶”这一独特视角，阐明了对“先天与后天”这一由来已久的心理学辩题的看法，使得读者在深入理解“厌恶”心理学之余，对于心理学乃至神经科学能有更加宏观的认识。本书的另一大特点是书中涵盖主题之广，几乎涵盖了与厌恶相关的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衣食住行，到政治、法律与道德，让读者深入彻底地了解“厌恶”，使人读起来有畅快淋漓之感。此外，作者援引了大量的案例以及实证性研究，使得本书既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又不乏趣味。加上作者幽默而又略带戏谑的行文风格，使得原本略显枯燥的心理学以及神经研究妙趣横生、引人入胜。

我们获得关于某种事物的态度或者信仰的主要途径是文化学习。父母用特定的餐具教育后代吃某些特定的食物，例如一勺冰淇淋；同样地，我们也可以通过文化遗传习得何种食物为恶心。“有什么吃什么”，之所以食物的地方性如此强，是因为它们往往来自于当地的同一植物群、动物群以及微生物群，如制作韩国泡菜所用的微生物与制作洛克福羊干酪用的微生物是截然不同的。此外，文化对食物的定义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我们用食物对敌友进行区别，并以食物作为种族分界的标准：“我吃这样的东西，而你不吃；我来自这里，你来自别的地方。”由此，我们不仅从文化中习得食物的含义，食物也同样可以划分文化之间的边界。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禁止食用

国外研究国学的大家，对很多问题思考比较深刻，值得翻翻。对个人来说，阅读也实际上也是生命陈长的过程。一个人阅读什么书，也就预示着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从外在的角度来说，阅读本身实际上是一个人对外在世界探索的方法，通过阅读可以收集到足够的信息和知识，从而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社会万象。从内在的角度来说，阅读实际上就是对自身生命潜质的开发，当我们发现书中作者的某个思想触动我们的灵魂，就有可能发现我们生命地脉里蕴藏的宝藏，生命的激情与潜能也由此而被激发，因为阅读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生命与生命、心灵与心灵之间相互感通的过程。阅读的德性也决定了个体写作的德性，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指出，阅读习惯造就写作习惯，“一般来说，人们怎样阅读就怎样写作。通常，细心的作者也是细心的读者，反之亦然。除非自己亲自小心地阅读，一个人不可能知道何为小心地阅读。阅读先于写作；在写作之前，我们已经阅读；我们通过阅读学习写作。一个人通过认真阅读好书——最用心地阅读那些被最用心地写出来的书——来学习认真写作。”

许纪霖先生在其《寻找意义》这本专著里面就指出了自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随之而来的种种灾难与冲击，以及建国之后的泛政治化，最近又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结果现代

人是没有精神家园的，或者说在精神上是沒有根底的。并且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很快，文化也逐渐变得市场化，现代人实际上是没有足够的心境和环境去追求精神上的成长。陈贇在其老师也写过《现时代的精神生活》中，指出现时代的精神生活困境是明显存在的。虽然说生活条件比以前强多了，但是人的精神生活反而跌落尘埃。真正对精神有价值的阅读是比较费力地。真正值得读的书，通常都是读堵起来比较吃力的书，那些读来非常轻松的书，实际上很有可能不值得读。因为对我们有益的书往往是能够给我们增加新的体悟的书，往往有我们尚不具备的某种特质刺激我们，试图契入我们的心灵，成为我们的内在蕴藏。这就需要我们试图改变自己原来的存在状态，而这种改变本身如同在我们的身体里嵌入新的东西，我们要在我们的灵魂中篆刻上新的图案，这种重新雕刻的过程是既漫长又有些痛苦的，因为心灵的东西是更加抽象的，需要反复的熏陶才能够占据我们的灵魂，改变扫除与之不符合的旧的习性。此外，就是我们要获得这种东西，往往必须寻找到正确的阅读方法，而为了灵性成长，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阅读经典。美国哲人阿兰·布鲁姆在《莎士比亚的政治》中指出，现在很多学生是非利士人，在圣经中非利士人多次被以色列人攻破，在西方文化中就是指外强中干的意思。实际上，他的老师列奥·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这部名著中也明确说到，现代人具有越来越多关于关于“鸡零狗碎”的知识，而对于真正启迪心灵、教化人性的高贵资源视而不见。

作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新生代学人，杜维明把自己“看作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 杜维明者”，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接轨，从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借鉴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知识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比较多地阐发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勾画了当代新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在东亚和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学术发展过程

杜维明自述：“在台湾的中学时代因受周文杰老师的启蒙而走上诠释儒家传统的学术道路，而在东海大学亲炙牟宗三和徐复观的教诲才是促使我体悟探究儒家人文精神的本质理由”，尔后负笈哈佛，“以比较思想史为范围集中探索儒学传统的核心价值”。此后，他抱定志向据此为业，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风雨兼程，矢志不渝地探究、注释、传播儒家文化。

杜维明将自身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学术起步到七十年代 杜维明上半期，他决心鼓起心力对儒家的精神价值作长期的探索，以此作为自己专业上的承诺。他努力诠释儒学传统，主要“反映了当时为推进一种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所做的努力”；第二阶段即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关怀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这一时期，他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工业东亚”、“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等。“我关怀的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第三阶段，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进一步拓展论说领域，更加关注“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全球伦理”、“人文精神”、“启蒙反思”、“印度启示”、“新轴心文明”等问题。“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以及全球化及本土化交互影响的氛围里，如何为儒学第三期的展开拓展理论和实践的空间，是我近来的思想焦点”。这些论域与“儒学创新”紧密相关。第一阶段是他的思想形成期，第二阶段是其发展成熟期，第三阶段是其进一步发展期。尽管杜维明的思想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但他的思想活动始终关怀着一个主题，即儒学思想的现代命运。

作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新生代学人，杜维明把自己“看作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 杜维明者”，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接轨，从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借鉴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知识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比较多地阐发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勾画了当代新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在东亚和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学术发展过程

杜维明自述：“在台湾的中学时代因受周文杰老师的启蒙而走上诠释儒家传统的学术道路，而在东海大学亲炙牟宗三和徐复观的教诲才是促使我体悟探究儒家人文精神的本质理由”，尔后负笈哈佛，“以比较思想史为范围集中探索儒学传统的核心价值”。此后，他抱定志向据此为业，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风雨兼程，矢志不渝地探究、注释、传播儒家文化。

杜维明将自身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学术起步到七十年代杜维明上半期，他决心鼓起心力对儒家的精神价值作长期的探索，以此作为自己专业上的承诺。他努力诠释儒学传统，主要“反映了当时为推进一种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所做的努力”；第二阶段即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关怀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这一时期，他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工业东亚”、“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等。“我关怀的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第三阶段，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进一步拓展论说领域，更加关注“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全球伦理”、“人文精神”、“启蒙反思”、“印度启示”、“新轴心文明”等问题。“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以及全球化及本土化交互影响的氛围里，如何为儒学第三期的展开拓展理论和实践的空间，是我近来的思想焦点”。这些论域与“儒学创新”紧密相关。第一阶段是他的思想形成期，第二阶段是其发展成熟期，第三阶段是其进一步发展期。尽管杜维明的思想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但他的思想活动始终关怀着一个主题，即儒学思想的现代命运。

《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本书是杜维明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第二部。

杜维明70年代初短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1-1981年转赴伯克利，本书所收文章是这一时期的心得随笔。伯克利十年，也是杜维明自动选择了一条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本书是杜维明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第二部。

杜维明70年代初短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1-1981年转赴伯克利，本书所收文章是这一时期的心得随笔。伯克利十年，也是杜维明自动选择了一条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本书是杜维明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第二部。

杜维明70年代初短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1-1981年转赴伯克利，本书所收文章是这一时期的心得随笔。伯克利十年，也是杜维明自动选择了一条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本书是杜维明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第二部。

杜维明70年代初短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1-1981年转赴伯克利，本书所收文章是这一时期的心得随笔。伯克利十年，也是杜维明自动选择了一条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本书是杜维明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第二部。

杜维明70年代初短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1-1981年转赴伯克利，本书所收文章是这一时期的心得随笔。伯克利十年，也是杜维明自动选择了一条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本书是杜维明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第二部。

杜维明70年代初短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1-1981年转赴伯克利，本书所收文章是这一时期的心得随笔。伯克利十年，也是杜维明自动选择了一条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本书是

杜维明70年代初短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1-1981年转赴伯克利，本书所收文章是这一时期的心得随笔。伯克利十年，也是杜维明自动选择了一条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本书是杜维明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第二部。

杜维明70年代初短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1-1981年转赴伯克利，本书所收文章是这一时期的心得随笔。伯克利十年，也是杜维明自动选择了一条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本书是杜维明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第二部。

杜维明70年代初短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1-1981年转赴伯克利，本书所收文章是这一时期的心得随笔。伯克利十年，也是杜维明自动选择了一条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本书是杜维明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第二部。

杜维明70年代初短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1-1981年转赴伯克利，本书所收文章是这一时期的心得随笔。伯克利十年，也是杜维明自动选择了一条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本书是杜维明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第二部。

杜维明70年代初短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1-1981年转赴伯克利，本书所收文章是这一时期的心得随笔。伯克利十年，也是杜维明自动选择了一条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本书是杜维明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第二部。

杜维明70年代初短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1-1981年转赴伯克利，本书所收文章是这一时期的心得随笔。伯克利十年，也是杜维明自动选择了一条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本书是杜维明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第二部。

杜维明70年代初短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1-1981年转赴伯克利，本书所收文章是这一时期的心得随笔。伯克利十年，也是杜维明自动选择了一条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

我们用理智来认识外在事物的能力永远赶不上在感情上想要进一层地去了解各种环境的欲求。这种理智和感情之间的鸿沟，是任何人都绝对无法弥补的。于是，稍有自知之明的人，总不免会发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叹息。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没有通过真切的体认，并不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就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而成为指导我们思考和行动的原则。不仅是个人，即使是家庭、社会，甚至国家、民族，也可能因为受到习见的影响而忽视了人性中一些放诸四海皆为准的基本价值。

譬如，没有一个人可以自觉地选择自己的父母、性别、出生地和成长的模式。不论科学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个命题总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有些迷信科学主义的“现代人”在宣扬试管婴儿的优生学时，好像竟完全忘记了他们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偶然性和神秘性。我们有太多的东西知道了，又如何忍心以人类的无知来决定21世纪人类的命运呢？

我并不相信宿命论，但我愈来愈觉察到自己生命中的未知数确有真实的意义。固然，劫数或命数的观念常被具有科学常识的现代人斥为无稽的迷信。我自己也从来不理睬手相之类的玩艺。就连影响建筑和营造事业极大的风水之术，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不过我对《易经》却有由衷的敬畏。美国海湾区的知识青年，常常用铜

钱和薯草来占卜，有些人甚至把每天得到的卦辞当做指导日常生活的准绳。在伯克利的电报街上摆摊子算命的人虽然还不多，但也已屡见不鲜了。凡是常在美国大学城逛书店的人，都会发现近年来美国知识大众对神秘主义的兴趣有与日俱增的趋势。西藏的密教、印度的民间信仰、日本的禅宗以及其他各种类似的宗教思想，都已在美国的知识界大行其道。以印第安巫术为背景的《唐璜的门徒》(时报曾以“先读为快”方式披露过)能够变成在全美畅销的奇书，也许只不过是这种潮流的例证罢了。否则，另一本奇书《禅和机车保养》，绝不会被《新闻周刊》的编辑们选为本年度十大佳作之一。

表面上，美国的知识大众(不仅是喜欢标新立异的大学新生)开始对“非理性”的知识热衷起来是一种“失落”的症候，也就是对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传统已丧失了信心。很多分析学派的哲学从业人员，如澳洲的派世莫(Passmore)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但托(A. Danto)，就一再表示东方神秘思想和西方理性主义是不相容的。如果欧美的知识大众不顾科学的批判精神而逐渐沉湎在毫无实证可能的神秘经验之中，那么西方文化的柱石——“理性”就有折毁的可能。赫德逊思想的主持人康(H. Khan)，甚至宣称古罗马的衰亡就和神秘主义有关，今天为一般美国大学生所推崇的书籍中，和神秘主义有关的作品所占的比例确是愈来愈大。要想找个对星相、练气、坐禅、服药、打太极拳和修瑜珈术毫无所悉的美国知识青年，已不容易。如果想认得一个在大学里攻读四年而完全没有听过克里辛那慕谛(J. Krishnamurti)、华兹(Alan Watts)、宗喀巴(Chogyam Trungpa)或赫斯(Hermann Hesse)的美国青年，那就更难了。这已不是“嬉皮”(Hippie)和其他“反文化”(counter-culture)的特殊现象，而是在美国中上层社会里也显而易见的普遍现象了。

其实，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在物理界崭露头角的美国专业人才，白天用最精密最严格的科学方法处理他的实验，下班以后把全部精力放在毫无“实证”根据的星相学上。这种看起来好像不相容的知识途径，在美国社会里已逐渐变成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了。以前科学主义的信徒总以为人类的进化是从宗教和哲学转向科学——在理性的科学时代，玄想的哲学和迷信的宗教最后都会销声匿迹的，因此理性绝不能和玄想或迷信之类经不起事实考验的心态并存于天壤之间。

还记得在“科玄论战”的时代，我国知识界一些泛科学主义者，竟把人生哲学也划归到因为不可证验所以毫无知识价值的玄学领域里。结果整个中国的儒学传统，尤其是宋明的心性之学，都因为不合“科学”而被曲解成过时的封建遗毒了。现在虽然距离科学主义弥漫中国学术界的20年代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但迷信科学万能的“玄思”在社会上仍有极大的潜力。这也许是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仍不能在台湾岛内知识界开花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固然，神秘主义并不能由一套简单的量化方式来证实，但内在经验是一种虽然尚不能清楚地被界定却是人人都能领会的真实感。如果我们因为现有的科技对这种类型的感受还不能加以解析就觉得它们是玄之又玄的迷信，那么不但禅宗的“顿悟”，就连宋明大儒的“变化气质”，也都会成为和现代文明不相契的历史陈迹了。

1964年伯克利校园的“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 FSM)是美国大学生政治自觉、非裔民权运动、全国反越战争最具象征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事件之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和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八大名校的差异至少有三点。它是二战以后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的代表，加州阳光带经济力量兴起的标志，和“青年文化”的突出表现。如果哈佛还洗刷不掉牛津和剑桥传统的英国烙印，芝加哥还无法超脱德国大学的科研氛围，加大则是地地道道的美国风味。不少加大本科生是来自从未接受过任何大专教育的穷苦家庭，很多是社区学院的转学生，付不起基本学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生，包括一批靠政府资助的退伍军人。他们大半都是佛家说谓“自力”而非“他力”修行的成年人，阅历深，独立自主的意愿强。我从几乎每一个学生都出自书香名门或富商大贾的普林斯顿来到皆是普罗大众的伯克利确有大解放大自在的愉悦。

北加州的海湾区天气宜人，环境优美，生活闲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轻松愉快。和东海岸，特别是新英格兰的凝重和紧张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人说美国大陆向西倾斜，无根之人都滑倒在加州，伯克利的纽约客人数不少，好像都是异化感极强的东部人。面向太平

洋的加州以高科技、好莱坞、葡萄酒、军工企业傲视美利坚共和国。放弃哈佛正教授职位移任伯克利社会学讲座教授职位的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曾因对里根和尼克松政权的不满分析了东西两岸既得利益者的差别：东岸的贵族代表老传统责任伦理还起作用，加州的权贵受暴发户心理的作祟，唯利是图、为钱是问，充分显现贪婪的凡俗的个人主义。或者正因为西岸没有传统，不受习俗和宗教的约束，创业拼搏的气焰特盛，常常出花招，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学术界亦复如此。在伯克利从事教研就不能没有创意。按部就班的为学态度好象和伯克利的学风很不相称。在学术界20世纪60年代是西化思潮转向现代化理论的关键时期，美国的社会科学大放异彩，现代性的标准不再是广义的西方而是美国现实的复制。伯克利大学生批判的对象即是美国“军工学复合体”所暴露的无知、傲慢和残酷。（本来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是“military-industrial-academic complex”，因为大学教授的激烈反对才改为“军工复合体”）。国内的种族歧视和国外的穷兵黩武显示了政治文化中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人（White Anglo Saxon Protestant）的白人优越感、大男人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欺外的情绪已刺伤了开国元勋乃至林肯总统极力提倡的“自由平等”的美国灵魂。伯克利大学生所掀起的言论自由运动虽然源于校园，但它指向的目标是华盛顿，触及的面相是整个社会，它所体现的不仅是政治抗议也是文化自觉。在伯克利校园，我感受到一种清新、温润而情意绵绵的关怀荡漾在摇旗呐喊的声浪中。这也许就是抗议精神的热火和“嘻皮”（Hippi）的柔媚并存乃至融合的理由。不过，美丽的“鲜花男女”（Flower Children）在旧金山市的风景线上只存活了几个月便被毒品、色情、暴力种种黄黑恶势所污染了。毕竟，由美国精英的精英（“bright and the brightest”）为了“反共”而卷入的越南战争是不自由的、不道德的、可耻的、彻底罪恶的国家行为。在腐化的后期资本社会中，文化的矛盾已升级到从口头争吵到肢体冲突的阶段。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可以说是1968年的全国学潮，芝加哥民主党提名大会的街头动乱，乃至美国政治的“保守”转向的先兆。我的伯克利经验使得我格外珍惜在普林斯顿任教4年的美好记忆。我和普大的师生相处极为融洽。牟复礼（F. W. Mote）和刘子健是我的忘年交。方闻、高友工、陈大端和梅祖麟是我的学长， Marius Jensen, Marion Levy, Walter Kaufman和Stuart Hampshire是跨学科的谈友。特别难忘的是和李欧梵、梅广及劳思光在不同时段相处对话的愉悦。学校为我提供的宿舍是在丛林中面对卡内基湖的两层套房。一层是厨房、饭厅和配有落地窗及阳台的大客厅，楼上有三间宽敞的卧房。在那里，我曾招待过很多亲友访客，包括京都学派的祭酒西谷启治和禅宗大师佐佐木承周。还记得平常我从宿舍顺着野花遍地的小径信步到办公室只需十来分钟，可是和西谷及佐佐木漫行数次后总要滞留多达半个小时之久。经过他们的点拨，除非有急事，我从家里漫步上班的时间拖长了不少，而且每次都会发现一些从未照面过的奇花异草昆虫动物。值得一提的是佐佐木禅师在普大收了几个徒弟，都是我中国哲学“习明纳”（seminar）的同学。其中一位Hal Roth后来成为他可以承接衣钵的高徒。当时我无法想象自己终其身在普大和本科生细读文本精研章句做个名符其实的汉学家。我的求知欲太过强烈无法适应普林斯顿闲闲而来的雅趣，因此每周都会到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听课或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由狄百瑞（William T. de Bary）主持的宋明儒学讲座。

杜维明著作系列·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 [下载链接1](#)

书评

[杜维明著作系列·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_下载链接1](#)